

第四章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一、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时，蒋介石和汪精卫既已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中国国民党也就变成由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它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国民党政权建立后，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任何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国民党先后通过了《制止共党阴谋案》和《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借此杀害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成立以来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这时，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是，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一个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激化。所以，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是深厚的，革命低潮是暂时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到来。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使革命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拜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周恩来任书记。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起义军向广东进军途中，由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天气又很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10月初，起义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遭到严重失败。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等领导人总结教训，决定起义军余部就地与农民结合，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南路地区，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到处是白色恐怖，共产党员和群众运动领袖被迫捕、屠杀。中共南路地委委员韩盈、梁木荣、钟竹筠先后遭杀害；南路各州市中共地方组织相继被破坏，党组织主要成员遭杀害。北海四二三事件之后，国民党当局以“企图破坏‘清党’运动，有异党分子行动”的罪名，强令合浦一中开除一批进步学生，并逮捕入狱。国民党合浦县党部委员、合浦县女子小学校长冯道先也被以“左派、信奉社会主义”等罪名被捕。被捕的学生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声援和营救下，不久先后获释。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南路地方组织仍然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南路地委发动各地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廉江、遂溪等县先后发动了农民武装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1927年7月，为了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撤销中共南路地方委员会，另成立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同时，成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广东分会南路支会”，以加强对暴动工作的领导和加强统战工作。

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强调工人阶级要时刻准备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会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南方局，并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到广东，主持南方局工作。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召开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鼓励党员准备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会议通过了《关

于拥护中央紧急会议决议案》，制定了广东省各县市的暴动计划和《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并派员分赴各地指导工作。南昌起义军失利后，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于10月15日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等多项决议，认为“广东各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潮，暴动计划应继续实现”。强调实行八七会议确定的革命的新政策，同时决定将全省的工农讨逆军改为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镰斧为标志，扩大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等。11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展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政权，并决定由张太雷组织广州起义。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联合举行广州武装起义。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随即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但在起义发动后，领导者没有及时把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这与中共中央于1927年11月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和急于占领中心城市的指导思想有关。由于未能及时退出广州，起义军虽在城内同英、美、日、法等国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等部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起义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是成功的，在战斗中也表现了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但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在南路地区，中共南路特委按照八七会议精神和广东省委会议精神的要求以及广东省委的武装暴动计划，积极领导农民武装发动起义，分别举行了高州沙田武装起义、化县武装起义和信宜怀乡武装起义等，并继续领导遂溪乐民、海山农民武装暴动。随后，乐民、海山农军撤到北海斜阳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继续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北海四二三事件之后，北海党组织被破坏，大部分党员被捕牺牲，幸存的共产党员转入地下活动。至1927年冬，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广东省委会议精神，经过整顿后，才恢复了北海党组织。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1928年2月，北海党组织与广东省委的联系人、坚持在北海工作的党员潘肇国被捕，另一联系人潘肇森（木匠工会主席）被通缉，去向不明。自此，北海党组织与广东省委的联系中断了，党组织活动也停止了，隐蔽的共产党员只好又转入地下坚持斗争。4月，中共南路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但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仍然认为当前的环境极适合武装暴动，要求党的力量要尽快进入广州湾、北海等中心城市，发展组织，实行暴动。6月，为了恢复北海党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派李复（福）、黄振业分别到

北海、合浦开展恢复党组织工作。但李复因经费欠缺和国民党封锁严密未能成行。黄振业到合浦后因工作难度大，又转回了香港。隐蔽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与此同时，为了尽快开辟南路斗争的新局面，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武装暴动，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将南路各县市划分为三类工作区域，要求一类区域要加紧工作，实现夏收暴动；二类区域列为可以工作，尽可能实现暴动；三类区域是暂时不动的地区。北海和雷州半岛部分县被列为二类地区，合浦和东兴列为三类地区。广东省委还要求南路特委要特别注意梅菪、北海等重要城市的工作。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南路特委先后制定了《农民运动大纲》、《士兵运动大纲》和《工人斗争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当前斗争的总任务和总方针。对北海党组织的恢复和工人运动问题，更在多次报告和会议中都有提及，要求尽快恢复北海党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南路特委还根据广东省委计划半年内全省发展一万名党员的安排，落实给北海发展党员 400 名的任务。11 月，北海市政筹备处裁撤警察局首任局长邝化机，由北海警察局代行市政职权。从此，北海市复归合浦县管辖，改为北海镇。

党的六大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提出了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的任务，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些对后来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大会对促成革命高潮的路线策略，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建立红军武装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问题认识不足，仍然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作为决定条件，对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未能根本纠正。因而，不能不影响后来的革命斗争。

11 月 19 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贯彻党的六大会议精神。会议批评了省委一月全体会议以来的“左”倾盲动错误，但同时批评了党的工作主要是领导农民斗争和“以乡村为中心”的方针；由于受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仍然强调以城市为重心。会议还决定南路、琼涯两特委合作，成立中共南区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南路和琼崖的党组织。南区特委以海口和北海为中心，领导各县开展工作。为此，南区特委机关拟从广州湾准备迁往海口市。这是在新形势下广东省委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目的是避开敌人锋芒，实行战略转移。海口和北海都是中国南海港口重镇，也是大革命群众运动较活跃的地区，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省委认为加强这两个地区的工作，有利于率先实行城市暴动。但是省委这个计划没来得及实现。12 月，由于叛徒告密，中共南路特委设在广州湾的机关被破坏，接着下属的高州、梅菪、廉江、遂溪等地的联络处也先后遭破坏，特委的主要领导人黄中民、朱也赤等先后被捕

牺牲。1929年3月，南区特委设在海口的机关遭破坏，特委成员也大部分罹难。这样，南区特委没能建立起来。幸存的南路特委委员、秘书易一德被任命为中共南路特委巡视员。他根据广东省委关于“南路、琼崖合并设一特委，设在海口或北海，把南路革命活动中心转移到北海来”的指示，来到北海等地坚持革命斗争，努力恢复南路党组织，并加强对防城等地的领导。5月，防城党组织被破坏。7月，易一德在北海被捕牺牲，北海的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南区特委主要负责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黄学增在海口也被捕牺牲。自此，南路的中共组织活动进入低潮。但从外地撤退来北海掩蔽，从事潜伏活动的4名共产党员，仍然艰难地独立工作，坚持斗争。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艰难地恢复建立起来的北海党组织不断遭破坏，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几度中断，党的优秀儿女一批批被捕牺牲。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一批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建北海党组织，领导北海人民继续革命斗争。

二、斜阳农军的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

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并初步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随后，全国各地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红军战争已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经过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经过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实践探索，并总结了全国各根据地党组织的实践经验，于1930年1月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批评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思想，而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思想，着重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重大意义，及其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从而形成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它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斜阳农军的武装斗争

1927年8月，面对大革命失败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起义农军遭受的严重挫折，中共遂溪

县委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做出重大决策，决定将尚存的农军分为两部分进行活动。由中共南路特委委员、遂溪县委书记黄广渊带领一部分农军留在遂溪县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农军由县委委员陈光礼带领进军徐闻山。

由陈光礼率领的农军于9月上旬到达徐闻山后，改造收编了山上的土匪陈中华部约数十人，准备坚守徐闻山。但却面临着遂、海、徐三县敌人的“围剿”。为了避实就虚，陈光礼率领的农军准备西渡，撤往斜阳岛。

斜阳岛是位于北海市区45海里处的一个小岛，面积1.89平方公里。由于孤居海中，远离大陆，交通不便；而且生存条件恶劣，岛上严重缺水，耕地稀少，因此斜阳岛历来就是海盗匪贼的匿身之地。岛上仅有20余户居民，主要以捕鱼为生。这时斜阳岛正被海匪符振岳所盘踞。符振岳是海康县人，父母遭地主杀害后，他杀了地主为父母报仇，并聚集10多人逃到徐闻山。1926年，符振岳率部逃到斜阳岛。此后投奔他的人很多，形成了一股拥有100多人的强悍武装。由于环境和经历的原因，符振岳与农军持有某种共识，在农军遭国民党“围剿”失败时，他也同情农军。他曾于1927年6月在国民党围攻乐民时，主动率部参战，帮助农军攻打敌人，并死伤了一些部属，又忍饥挨饿三天两夜。在农军放弃乐民后，他仍回到斜阳岛，并不居功，也无怨言。中共南路特委认为这是一股有着一定培养潜力的革命势力，曾指示农军对他们进行收编，壮大革命队伍，但却遭到符振岳的拒绝，符振岳部不愿任何队伍的收编。因此，农军在上岛前，为了避免与符振岳部发生矛盾，派代表与符振岳接洽，说明农军的宗旨和目前的处境，农军希望上岛，与他们团结一致，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取得符振岳的同情，允许农军上岛。

1927年9月，陈光礼带领100多名农军战士秘密撤到斜阳岛，开始了革命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随同上岛的还有遂溪县县委委员、南路农民运动巡视员薛经辉等一批中共党员。

符振岳虽然同情农军，但又心存疑虑，向农军提出“你干你的革命，我捞我的世界”的共处原则。农军上岛后，符振岳部的作风与农军严明的纪律形成鲜明的对比，符振岳的部下吊打关禁抓来的外地船户，勒索赎金，使农军很反感。陈光礼公开向群众声明：“打人吊人不是共产党的做法。”农军领导人一方面劝告符振岳约束部下；另一方面以农军的模范行为去感化他们。每天早上，农军战士按时举行升旗仪式和出操，看着冉冉升起的犁头镰刀红旗，符振岳部感到农军有一股生气；晚上，农军聚在油灯下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或听陈光礼、薛经辉等讲述革命道理，讲述俄国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等，使那些只知猜拳行令的符振岳部属倍感新鲜。经过一段时间的耳闻目睹，符振岳部逐步提高了觉悟，内心萌发了加入农军队伍，成为农军队伍中一员的强烈愿望。农军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待人和气，保护群众利益，使得符振岳十分叹服。符振岳也在陈光礼等的帮助教育下，懂得了“打倒列强，清除军阀”的道理，明白了只有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农军联合，才能壮大革命势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得到解放。终于主动向农军提出同意改编，参加农军队伍。

1928年5月，农军改编成立大会在濠洲岛南湾街举行。参加改编成立大会的除农军各级指战员外，还有濠洲岛上的各界人士和居民。会上宣布：符振岳、陈中华部正式加入农军队伍；农军总指挥为陈光礼、副总指挥为薛经光；农军编为两个营，第一营营长符振岳、副营长陈中华，第二营营长薛经辉、副营长余道生。陈光礼在会上发表演说，陈述农军的宗旨，实行革命的方针和任务。会上颁布了“安民告示”：“照得蒋贼介石，卖国反动殃民，勾结帝国主义，一意媚外求荣，本军奉命讨伐，是为顺应民情。……倘有军士不法，准到本部指明，一经查实有据，立刻按法究算。……”告示说明了农军的性质，表示了农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还申明了农军的纪律。会后建立了斜阳、濠洲、北海（江洪）的对外联络点。

农军改编后不但力量加强，思想得到统一，而且符振岳及其部属接受了党的领导，自觉清除了身上的匪气，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更显示了党领导下的农军的人格力量和感染力，增强了农军的威望和影响。

农军队伍的改编标志着中共南路地方组织由组织单纯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转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上来。斜阳农军是中共南路地方组织最早掌握的一支人民武装力量。虽然斜阳农军的基本方针仍然没有脱离“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但其具体行动已开始实行争取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策略。

中共南路特委对斜阳岛农军队伍十分关注，除要求加速收编符振岳部外，还加强了斜阳农军的党组织建设。1928年7月，中共遂溪县委恢复后，中共南路特委任命陈光礼为南路特委委员、遂溪县委书记，并负责在斜阳岛上建立党的组织；任命黄埔军校毕业生薛经光为南路特委委员、海康县临时县委书记，并派其上斜阳岛，协助陈光礼加强党组织建设和军事工作及改编符振岳部；任命薛经辉为南路特委委员。

农军在斜阳岛上建立革命根据地后，为了尽快将革命势力扩展到雷州半岛，同时也为了摆脱长期据守孤岛，供应困难，发展余地窄小的困境，于1929年春率兵回师大陆，配合黄凌氏率领的陆上农军，两次袭击遂溪海山、乐民、余村、桂坡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武装，烧毁反动豪绅黄友明（国民党高雷区“清党”委员黄河津的父亲）的住宅，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毙伤敌多人。1929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从安铺、遂溪等地集结近千兵力，攻打农军。在激战中，双方均有伤亡。但由于敌强我弱，农军又撤回斜阳岛。虽然斜阳农军这次没能在大陆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夺取国民党占领区，但对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给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南路人民以极大鼓舞。

9月，正值爆发张发奎、俞作柏联盟反蒋（介石）斗争之际，驻守南路的国民党旧军人陈可章起兵响应，加入到反蒋行列。斜阳农军趁机再次回师大陆，决定利用与陈可章的友好关系，联合陈可章部，开辟南路新的革命根据地。9月7日晚上，陈光礼、薛经辉率领斜阳农军100多人，乘两艘帆船从濠洲出发。9月8日，斜阳农军在遂溪西北部北斗仑村与陈可章部会合。当天两支队伍配合作战，一鼓作气占领遂溪县城，消灭一批敌军，缴获一批枪枝弹药，并打开

监狱释放了约 300 名革命同志，同时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公开处决，举行祭奠韩盈等革命烈士的仪式。9 月 9 日，国民党残兵退至赤坎麻章顽抗，农军久攻不下。9 月 10 日，驻廉江国民党兵大批增援，农军只得撤回遂溪县城。在强敌追迫下，农军辗转在安铺、徐闻之间。农军原计划撤到海南岛，与那里的革命队伍会合，但这时陈可章却把队伍解散，自己逃往香港，农军势单力薄，只得再次撤回斜阳岛。

斜阳农军多次回师大陆，攻占了遂溪城，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不少群众参加了农军队伍；并在战斗中缴获一批武器，增强了农军的战斗力。但此举却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命令遂溪县长、高雷区“清党”委员黄河泮，国民党南路警备司令陈章甫迅速歼灭斜阳农军。于是黄河泮、陈章甫更加疯狂，加派兵力向斜阳岛进攻。同时，在沿海一带增设岗哨，严密封锁海岸；在大陆则大举清乡，疯狂屠杀群众。

12 月，南路的形势又起了新的变化，由于叛徒告密，中共南路特委设在广州湾的领导机关被破坏，特委领导人黄平民等 10 人先后被捕牺牲；接着高（州）、雷（州）、廉（江）以及钦廉四属的党组织联络机构也被破坏，南路党组织与广东省委的联系中断。这时，中共遂溪县委设在濶洲岛与斜阳农军的联络站也被破坏，斜阳农军便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处境日渐艰难，只好一边开荒种地、下海捕鱼，坚持斗争；一边加紧防御，寻找上级党的组织。1930 年 3 月 5 日，联桂反蒋的张发奎部独立第四军 1 个团由薛岳率领，从灵山县进抵廉州。驻合浦县粤军 1 个营退避公馆六湖垌，合浦县县长宁可风率县兵队与钦廉警备总队长李洁之退往北海，转登船至濶洲岛，然后转赴广州。张发奎部在合浦收编土匪，向党江盐商等搜罗军费银元 6 万多元。3 月 7 日，张发奎率第四军进驻北海，接管北海海关，拟提取关税充军饷，北海海关英籍税务司穆尔坚拒未允，后由商人向各商户筹款解决。3 月 24 日，粤军第八路军自廉江进逼合浦县境，张发奎部撤退。3 月 27 日，粤军第八路军进驻北海，广东省政府派国民党南路警备司令陈章甫驻守北海。4 月，斜阳农军派战士黄学武、薛经泰回大陆联系党组织，但在江洪港遭到敌人搜查，不幸被捕牺牲。6 月 15 日，斜阳农军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斗志，乘黄河泮已带兵回遂溪县城之机，由二营营长余道生率领部分农军秘密潜回大陆，攻占了乐民乡公所，击毙敌兵 8 人，俘 16 人。并在乐民圩张贴标语、告示，宣传革命火焰是扑不灭的，号召群众坚持斗争，革命到底。不久，农军主动撤回斜阳岛，黄河泮带兵赶来，扑了一空。8 月 24 日，黄河泮、陈章甫纠集江洪等地反动民团，会同合浦警备区反动部队，强征几十艘民船，再次进攻斜阳岛。被农军打退以后，则采取了“铁壁合围”的方式，将斜阳岛团团围住，不准任何船只开往斜阳岛，历时一个多月，企图将斜阳农军困死。斜阳农军紧紧依靠群众，军民联合，坚守阵地。待敌人近岸，则枪弹、石头齐发，打得敌人头破血流，不少敌人溺毙海中。

11 月，为了尽快摆脱困境，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中共遂溪县委在斜阳岛召开党、军

领导人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1)由陈光礼赴海南岛联系琼崖党组织，以便将农军转往海南；(2)陈光礼离岛后，由薛经辉代理遂溪县委和农军的工作；(3)加强做好歼敌保岛准备工作。11月27日，陈光礼和战友惜别后，离开斜阳岛先到广州湾，后去海南。1931年春在海口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1931年3月，国民党南路警备司令部裁撤，北海驻军调往广州。北海防务由平南运销查验局局长何治伟接管。8月，平南运销查验局令：飭盐警队会同廉阳水师统带合组“水陆军警联防办事处”，水师有巡船8艘，装备齐全。涠洲至竹山一带海区均属警戒范围。9月，黄河泮、陈章甫又纠集地方反动民团，乘坐几艘机船，大举进犯斜阳岛，但被岛上军民英勇还击。双方战斗持续了20多天，敌人惨败而撤回大陆。攻一孤岛，屡次败北，使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大为震怒，又一次强令黄河泮、陈章甫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攻下斜阳岛。1932年5月，陈济棠命令陈章甫率第三独立团第二营担任主攻“进剿”斜阳岛，另以廉阳水师统领赖悦棠、李基文率领的6艘战船，大土豪王广轩赠送的两艘汽船，以及掠来的80艘民船前往斜阳岛助战，陈济棠又增派2架飞机和“安化”、“广金”、“海虎”3艘军舰来配合进攻，陈章甫派国民党南路警备区代参谋长兼作战处长林廷华亲临涠洲岛督战，用“铁壁合围”长期围困战略，全力围攻斜阳农军。面对强大的敌人，斜阳农军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浴血苦战。在坚持了几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斜阳农军以原始的武器和石头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但农军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一营营长符振岳和二营营长余道生先后英勇牺牲，农军副总指挥薛经光又借故离开了斜阳岛，农军伤亡惨重，弹药粮食缺乏。

在弹尽粮绝、敌人疯狂进攻、处境更加恶化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薛经辉作出了分批撤离斜阳岛的决定。11月21日晚上，第一批撤退的10多个农军战士分乘两艘小艇，离开斜阳岛，薛经辉率全体战士、家属们到岸边为他们送行。他们前往江洪港找船，准备把岛上的农军全部撤离斜阳岛。但是，没等到找船的农军战士返回，敌人已加紧了对斜阳岛的进攻。陈章甫向王敬贤下死命令，限15天内攻下斜阳岛。王敬贤只好用大洋收买100多人组成了“敢死队”，在飞机和军舰大炮的掩护下，向斜阳岛几个要塞轮番攻击。不久，斜阳主要的出入口东埠港被攻破，接着北埠、三条柴、灶门等阵地相继失手，农军战士或战死，或与敌人肉搏至同归于尽，或跳崖、跳海殉节，境况尤为惨烈。最后薛经辉率领剩余的农军退至羊咩洞，坚守一星期后，终被敌人捕获，押至北海。12月初，薛经辉等44名斜阳农军战士在北海西炮台刑场被处决。临刑前，他们一路唱着雷州山歌，一路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至此，轰轰烈烈的南路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斗争进入了低潮。

斜阳农军武装斗争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斜阳农军武装斗争在南路革命斗争史中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斜阳农军是在中共南路地

方组织和领导下产生的，斜阳农军武装斗争与自发的农民武装斗争不同，其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发展策略。举行遂溪乐民、海山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黄学增、黄广渊、陈光礼、薛经辉等都是早期中共南路地方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于1927年5月14日发动了南路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农民武装暴动。在南路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这些农民武装暴动逐渐发展到斜阳农军武装斗争。因此，斜阳农军一开始就置于南路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斜阳农军武装斗争与自发的农民武装斗争不同，其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发展策略。第二、斜阳农军对符振岳、陈中华部的收编和对国民党旧部陈可章部的联合，显示了斜阳农军对统一战线灵活运用和农军高超的斗争艺术。由于历史原因，南路地区是匪患严重的地区，而斜阳岛由于远离大陆，又成了匪巢之一。这些土匪一般是贫苦农民，他们有支持革命的一面，但却是典型的流氓无产者。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收编土匪，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斗争初期普遍性的问题。在1927年南路的五次暴动（遂溪暴动、吴川暴动、廉江暴动、信宜暴动、茂名暴动）中，曾有四次收编土匪的打算，但最终没有收编成功，正如中共南路特委会议决议中指出：“这些土匪一般不受任何部队的收编。”斜阳农军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收编符振岳、陈中华匪部，主要是因为斜阳农军采取了以模范行动和有计划地对土匪进行教育和改造的策略，而不是单纯采取利用和依赖土匪的态度。第三、斜阳农军武装斗争的经历极其悲壮。农军在岛上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环境恶劣、孤军无援的情况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围剿”。特别是在最后的斜阳岛保卫战中，农军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抱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仰，进行了浴血苦战，农军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薛经辉等44名农军被俘，在北海西炮台英勇就义。坚持了5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斜阳农军武装斗争，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这是我们在新时期必须继承和发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

斜阳农军武装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1)斜阳农军武装斗争在土地革命时期南路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南路地方组织掌握的第一支人民武装，这支人民武装的产生是与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方针政策相一致的。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全党正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因此，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选择就是高举武装斗争旗帜，进行武装反抗。1927年，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各地方党组织也先后举行了各种起义和暴动。斜阳农军武装斗争就是南路地区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最早的武装暴动之一。这些起义和暴动虽然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2)斜阳农军武装斗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南路地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农军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得不到及时救援，致使斜阳岛农村革命根据地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在斜阳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符合以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为后来南路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对南路地区农军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